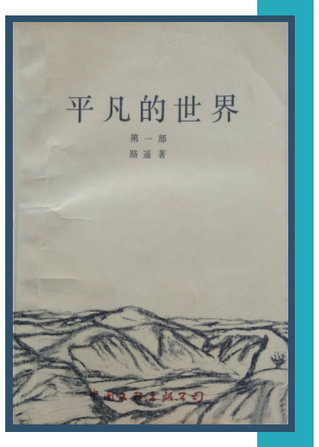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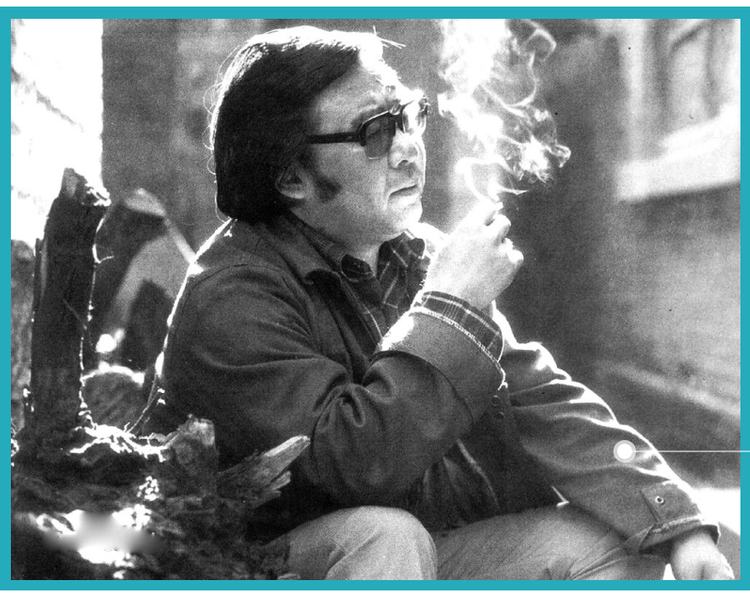
杨辉

路遥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




路遥

自1980年代末至今，《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的长销，充分说明路遥的创作有着并不局限于其写作年代的重要意义。从长远目光看，这30余年间，文学观念和思潮表象似乎变幻无定，但路遥所坚守的现实主义传统却始终是文学的主流，影响力不曾衰减。由路遥作品所开启的文学世界及其间典型人物所面临的基本生活情境，也足以指称更为复杂的文学和社会现实。内心的诗意和现实的非诗之间的矛盾冲突，乃是《人生》以来路遥的人物所面临的基本情境模式。这种模式显然相通于列文所论的“吉坷德原则”——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为其基本特征。个人面对强大的外部世界，渴望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或成或败或得或失，生活经验所昭示的结局不外如是。但在成败得失之间，艺术可以以其巨大的力量挽狂澜于将颓。这便是路遥的作品即便有对生活辛酸的细致书写，却总能使普通的生活充满澎湃的诗情和生生不息的力量的原因所在。这种力量的核心乃是坚信即将展开的未来有着超乎寻常的意义，而个人虽属“历史的中间物”，其对于现在和未来之间的联结作用却须尽力发挥。文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彰显其作用于现实的实践品格和伦理目的。而有无依托时代的总体性思想从而获得朝向未来的精进力量，是辨别作家文学观念分野的重要维度。

路遥（1949～1992），陕西清涧人。1976年毕业于延安大学中文系。曾为农民、小学教师，《延河》编辑，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副主席。1973年起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协。《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平凡的世界》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在总体性的宏阔视域中观照并书写日新月异的现实，肯定性地回应时代的精神疑难，是路遥创作的重要特征。不同于新时期以降在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影响下“向内转”的写作方式，路遥始终把眼光投向广阔的外部世界和正在行进中的波澜壮阔、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并努力全面、系统而深入地思考社会整体变革之于普通人命运的意义。他的作品始终有着宽广的视野、深刻的思想和巨大的生活容量。即便是篇幅较小的作品，路遥也试图以小见大。《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孙少安及田福军三条线索分别表征着变革时代的复杂面向和多样可能，这种可能无疑可以指涉更为宽广复杂的社会现实。在他笔下，个人即便面临难以克服的重重困境，却并非孤军奋战，时代精神、地域文化，甚或文学所开显的虚拟世界均可成为奋斗的底色和背景，成为个人可以依凭的现实或精神家园。

1980年代“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虽无法重返《创业史》等作品所展现出的紧密状态，但个人仍然不能脱离集体而独立完成其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新的人物必然与新的时代互动共生，秉有与时代可以相互定义的重要内容。他们是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荷着时代的阶段性难题并尝试获取历史性的解决方式。路遥小说终极的伦理意义，正是在以想象的虚拟方式，参与并推动社会的车轮滚滚前进。而相较于对所谓的生活真相的简单指认，以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虚构作品完成对现实问题的索解无疑更为紧要。也因此，《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困难的日子里》《平凡的世界》等作品虽有对现实困境的扎实细密的书写，却仍然洋溢着内在的理想主义的情怀，包含着对新的世界的希望和对更为美好的生活形态的不懈追求。这样的文学世界自有一种“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正因如此，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尚在奋斗中的人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获取不息的前进力量，并时常感受到现实冰冷的逻辑之外仍有令人心动的温暖和爱。

关怀底层大众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考察他们的命运如何在大时代中获得根本性变革的可能，是“人民文艺”的重要特征。路遥有极为丰富的底层生活经验，那些活在他笔下的普通人物或许便是他的父母、兄弟，他爱他们和他们脚下的土地。他就在他们中间，与他们一道前进并深刻地体验到时代的巨变如何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他在1960–1970年代初因文学而发生的个人命运的转换无疑是高度历史性的，乃是时代巨大的力量使然。也因此，生活对路遥而言便不仅是获取写作原材料的简单方式，而是如何与普通劳动者休戚与共，共同进退，在完成对他们生活故事的叙述的同时，也完成作为作家的自我塑造。因为在他看来，作家实在只是普通劳动者中的一员，不过是以与普通劳动者不同的精神方式，完成个人之于时代和社会的责任。他行走在乡村城镇、工矿企业、学校机关、集贸市场，力图纵横交织地去全面体察千姿百态的生活。而以文学的方式参与正在进行中的社会实践，以充分发挥文学的经世功能，乃是路遥文学的重要出发点。也因此，无论早年的《优胜红旗》《基石》，还是写作初变之后的《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以及其思想和风格集大成之作《平凡的世界》，均有着极为明显的现实关切，涉及不同时期重要甚至紧迫的现实问题。而居于其文学世界中心的，始终是身处底层的普通人。他们置身时代和精神困顿的深处，是新的时代所召唤的“新人”。马延雄为群众利益甘愿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乃是葆有革命的赤子之心的一代人精神的真实写照。高加林的自我奋斗也包含着更为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内容。孙氏兄妹则表征着转型期青年人人生愿景的不同状态。而正是在新的时代和新的人物的交相互动中，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并始终朝着更为美好的未来敞开。作为作家的路遥并不自外于这些有着充沛生命力的鲜活人物，他始终将文学创作视为一种劳动，一种与父母的生活劳动并无本质区别的生活和生命方式。这种方式要求作家有巨大的情感投入，有对生活的热情和爱。他在写作过程中为哪怕一行创造性的文字而付出的巨大的艰苦的努力成就了其作品卓然独立的经典品质。如他眼中的柳青一般，他“始终像燃烧的火焰和激荡的水流”，力图将丰富复杂的日常生活和艺术家的巨大诗情融汇在一起。他的作家的劳动因之区别于那些仅仅谋求写作技艺的革新或拘泥于一己之悲欢的与具体生活世界、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疏离的闲赏文字。写作既属“劳动”之一种，也便自然包含着一定的实践价值和伦理目的，包含着时代包容载重的巨大容量，且可以成为时代的重要记录而具有超越时代的历史意义。

路遥（右）在陕北农村走访

秉有经世功能和实践意义的文学，自然远非吟风弄月、个人感怀式的作品所能比拟。出于对历史范畴的连续性深刻洞察，路遥并不赞同现实主义终结、现代主义必将取而代之的潮流化观点。时隔20余年后，在更为宽广也更具包容性的文学史视域中返观新时期以降文学思潮之流变，路遥如上观念的价值愈发凸显。而他对现实主义的坚守，也需要在更高的意义上得到理解。如论者所言，捍卫现实主义这一成就斐然的重要文学流派，乃是现实主义所持有的若干重要原则之一，“渗透着公开地和真诚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愿望”。而把“现实主义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亦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客观要求。如若文学秉有浓重的现实关切，有着从时代精神总体性角度想象并处理阶段性现实问题的努力，那么，现实主义所依凭的思想和审美传统自然是其必然的选择。从他的文学领路人柳青那里，路遥认识到仅仅满足于个人所认识的生活小圈子，或者干脆躲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去创作，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也不必拘泥于写作方法的新变与代际，因为“问题不在于用什么方法创作，而在于作家如何克服思想和艺术的平庸”。路遥的全部创作活动说明，具有内在的质的规定性的现实主义并未过时，而是仍有着充沛的生命力，有着表达日新月异的现实和底蕴深厚的历史的丰富可能，现实主义是一条广阔的道路而非窄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表征着作家的思想力和认识力，他观察和理解现实的高度、深度和广度，以及克服狭窄的文学观念和理论视域的能力，最为重要的，还有他能否洞见文学之“常”而有勇气坚守且不至于被一时的风潮挟裹而去。

“作家的劳动绝不仅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这是路遥类同于柳青的文学观念的重要面向。柳青以为，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应以60年为一个单元。《平凡的世界》出版至今不过30余年，但其作为1980年代现实主义经典的意义愈发凸显。系统梳理并重评路遥写作的价值和意义，已成为考校当代文学史观念限度的重要方式。唯有在更为宏阔的历史视域中建构更强的包容性和概括力，且更为准确地理解20世纪中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历史意义的文学史观念，路遥创作的价值和意义方能得到更为充分的阐发。以路遥创作为基础，既可重新理解柳青、赵树理等作家作品的文学史意义，亦可重启社会主义文学的若干重要思想和审美空间。当下文学如何突破新时期以降思想和审美视域的局限，路遥的创作及其核心面向可作重要参照。

欢迎关注中国作家网
www.chinawriter.com.cn
本专刊与中国作家网合办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研究

宫铭杉

《平凡的世界》

一部有待全面认识的长篇佳作

说起《平凡的世界》，人们可能会忆起在1985年秋天路遥开始写作《平凡的世界》时，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席卷全国，不断渗透到作家的写作以及专业读者阅读趣味中的文坛背景；可能会记得路遥在创作出第一卷本后寻求发表与出版之际的冷遇以及作品的第一部刚刚面世时文学评论界相对消极的声音；还可能会想起《平凡的世界》在全国范围内引发的轰动效应与阅读盛况……但在文学评价体系越来越专业化的今天，以上这些就是《平凡的世界》的全部面孔吗？如果调查当下中国的文学阅读生态，进一步了解文学作品的生产、传播、评奖以及接受过程，并结合文学研究界对《平凡的世界》的评述，也许我们能更全面地认识这部作品。

成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从1981年设立至今，茅盾文学奖评奖已进行到第10届。奖项的设立是为了评选并褒奖兼具文学性与思想性的长篇小说，推动长篇小说创作。获奖作品应该代表着评选年份之间当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水平，能够为同题材或同类型的文学创作构建一种审美范式，并在艺术手法上进行有益的探索。

1991年3月30日，路遥作为获奖代表在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大会上致辞，他舍弃了准备好的发言稿《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选择用简短的语言抒发了内心的感受，这次发言被收录在《路遥全集》中：

对于作家来说，他们的劳动成果不仅要接受当代眼光的评估，还要经受历史眼光的审视，以伟大先驱茅盾先生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文学奖，它给作家带来的不仅是荣誉，更重要的是责任。我们的责任不是为自己或少数人写作，而是应该全心全意全力满足广大人民大众的精神需要……人民是我们的母亲，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才有可能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

这段话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平凡的世界》能够获得茅盾文学奖。

不可否认《平凡的世界》在大众中因情感共鸣与精神共振而产生了“轰动式”影响。这种轰动式影响一定程度上要感谢“长篇连播”节目。厚夫在《路遥传》中提到，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测算，当年《平凡的世界》的直接听众达3亿之多，这些听众还拥向书店，高涨的阅读热情使得小说在获奖之前，总计已卖出几十万册。

《平凡的世界》也包含了路遥个人的经验，他从个人对生活的理解出发来写作。难得的是，路遥为了真正介入到小说的年代历史背景，耐心又细心地查阅报纸，了解在某个具体的时间点一个地区发生了什么，进而把历史现实放到动态进程中把握，将个人的经验、他人的经验与社会发展进程、国家的社会现实与历史相融合，使之成为一个肌理丰富，又如微缩全景景观的有机整体，实现了文学与社会现实和时代历史之间的联系。

《平凡的世界》也包含了路遥个人的经验，他从个人对生活的理解出发来写作。难得的是，路遥为了真正介入到小说的年代历史背景，耐心又细心地查阅报纸，了解在某个具体的时间点一个地区发生了什么，进而把历史现实放到动态进程中把握，将个人的经验、他人的经验与社会发展进程、国家的社会现实与历史相融合，使之成为一个肌理丰富，又如微缩全景景观的有机整体，实现了文学与社会现实和时代历史之间的联系。

我们应该意识到，茅盾文学奖与获奖作家、作品之间相互成就的关系。茅盾曾指出：“作家不但要描写社会的真实背景，而且要隐隐指出未来的希望，把新理想新信仰灌到人心中。”路遥所塑造的人物经历着平凡但却伟大的生活，这些人物形象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时代，至今仍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在历史语境中，《平凡的世界》被一代青年视作“励志小说”，它激励的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中渴望走出乡土、改变个人命运的农村青年、小镇青年、城乡交叉地带青年，成为了一代人奋斗青春的代名词，甚至成为一种独特的精神文化符号。

大众阅读视野中的“长销书”

仔细翻看《平凡的世界》的“履历”，你一定会惊叹于它的生命力与辐射力。《平凡的世界》自1986年12月首次出版至今，一直以各种方式影响着读者：1988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平凡的世界》广播剧，1990年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2014年再次被改编成电视剧，2017年改编作品被搬上话剧舞台等。

大部分读者心中都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即《平凡的世界》卖得好，但是到底有多好呢？2019年7月，北京开卷公司“开卷书榜”的数据显示，《平凡的世界》已连续24个月进入零售渠道虚构类图书的畅销书榜前30名，上榜最好名次为第2名。并且在榜单中，《平凡的世界》普及本与三卷本存在同时上榜的情况，比如在2019年第28周的实体书店畅销书榜上，该书普及本与全集三卷本销量分别位列第4名与第9名。无论是线上零售，还是线下实体书店的销售，《平凡的世界》都称得上是畅销书了。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图书市场的销量或多或少也受到了教育政策的影响，比如语文学科新课程标准将《平凡的世界》规定为必读书目。但如果对比同样是必读书目且进入开卷书榜零售渠道榜单前30位的《红岩》的百度指数数据，就会发现在最近的90天里，《平凡的世界》的百度指数平均高于《红岩》8000点。而且，基于百度搜索的用户行为数据以及画像库可知，搜索“红岩”的用户其兴趣点更多在于“教育培训”的应试目的，而搜索“平凡的世界”的用户兴趣占比中，对书籍阅读的兴趣更高。

在一些线上图书销售网站中，我们可以看到大众读者在商品评论区中对《平凡的世界》的评价。读者留言不局限于以往商品评论区对商品质量的评价，还写下了他们对于《平凡的世界》诸如“感动”、“震撼”、“受益匪浅”等阅读感受。

商业市场中的图书销量、普通民众的网络搜索数据、大众读者的阅读感受等，都体现了《平凡的世界》对大众读者实际产生的影响与效应，由此不难发现广大读者对于该作品的极高接受度。这表明《平凡的世界》是一本具有独特文学魅力、备受读者青睐的长销书，它构成了大众读者当下真实的社会文学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文学现场的重新厘清

相较风靡于全国读者的“路遥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史书写中，比如洪子诚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王庆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当代文学》中，没有对于路遥创作概况的论述，或缺少对于路遥重要作品的论述，这种文学史对《平凡的世界》的忽视被不断重提，学术界也不断有学者对此发声。

陕西人艺话剧《平凡的世界》剧照

洪子诚曾回应过为何忽视《平凡的世界》，他坦称自己在与高校学生交流时不止一次被问到类似问题，“20世纪90年代写文学史，确实对他（路遥）没有特别的关注，也翻过《平凡的世界》，感觉是《人生》的延伸，艺术上觉得也没有特别的贡献，那时我也不知道他的小说在读者中的广泛影响。这也许就是一个疏忽？当代人写当代史，缺失、偏颇、疏漏应该是一种常态。我们常常举的例子，就是唐朝人选的唐诗选本经不起时间的检验。”诚然，完全认清一部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需要更长的时间背景与前提，在阅读文学研究者对文学作品的印象与评述时也需要有对时代文学背景的“同情之理解”，而既有论述也需要被重新激活、不断更新，曾经对于《平凡的世界》的忽视并不意味着将其置于主流的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之外，或否定它的意义。

我们亟待重新厘清：该如何在当代文学历史化的进程中定义《平凡的世界》，或者说，应该将《平凡的世界》放在怎样的文学史位置上？这一问题不仅仅是对《平凡的世界》的艺术表现手法在既有文学史框架中的简单归类，更是从根本上剖析路遥所继承的文学传统以及他铺开的新路。在肯定《平凡的世界》成功地树立起孙少平、孙少安、田福军等独具性格的人物形象的同时，是否可以将这些人物形象放在更宽广的文学背景中重新理解？一直以来，路遥都将柳青视作他的精神导师，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为他提供了力量，从这种柳青式“文学道路”的角度上看，孙少平、孙少安、田福军等人是否是沿着柳青的《创业史》中梁生宝的“新人”路径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打上了属于时代的烙印？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不仅会影响它的读者，还会影响后来作家的创作，那么从这种意义上说，除了关注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写了什么，是否还应该将侧重点放在他的创作过程以及接受史上？路遥用《平凡的世界》书写了广大人民与时代之间的深刻联系，而《平凡的世界》与超越时代的诸多问题——它与“十七年文学”“改革开放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之间隐秘又不容忽视的关系——都等待着重新挖掘与探索。